

◀ (上接 14 版)

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几乎最重要的吐鲁番新出墓志资料来源。2003年,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出版, 至今依然是最权威的资料著作。

侯先生的楼兰研究, 是其以考古学家身份而引人注意的。经过前一年的勘察, 1980年春天, 有东西两支考古调查队进入楼兰故城地域, 侯先生是西队队长。在一个月的考古调查中, 收获丰富。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楼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 深受各界重视。1984年, 侯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一文, 因为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 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1988年《文物》第7期发表侯先生的三篇文章, 分别是《楼兰新发现木

简纸文书考释》《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和《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 集中展现了1980年楼兰考古的新成就。长期整理楼兰出土资料, 研究相关问题, 1999年, 由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 可以看作是侯先生多年积累的结晶。有关和田的研究, 侯先生主要是围绕麻札塔格古城堡进行了讨论, 涉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及和田绿洲的变迁等问题。

学术研究难免会落下遗憾, 侯先生也如此。有一段时间, 我看见侯先生把所有的高昌史料都摆了出来, 卡片密密地布满大床, 侯先生想整理出麹氏高昌的朔闰规律。大约是1990年上半年的一天, 我到侯先生家, 侯先生说了声: “小孟啊!” 这次, 声音有些低沉。侯先生拿出一本《出土文献研究续集》, 其中有王素先生的大作《麹氏高昌历法初探》, 文后附有长长的《麹氏高昌朔闰推拟

表》。学术撞车了, 侯先生的功夫白费了。侯先生显然很受打击, 苦笑着: “这就是学术啊。” 这样的事, 只能坦然接受了。有关楼兰考古的报告, 至今只有简报, 没有发表报告。侯先生已经调到新疆师大, 整理工作似乎并没有停止。我确定看到过他的书稿, 书名类似于《楼兰考古调查报告》, 见其中有表格, 有线描图, 也有照片, 尤其对照斯坦因等从前的工作说明如今的进展, 感觉很有学术意义。不过, 我关心的是高昌问题, 楼兰的事不太在意。后来听说, 侯先生把书稿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 再后来遭遇挫折, 有人写信表示反对出版, 似乎是署名或者单位有问题, 书稿被退回。书稿不能出版, 个人的功夫又白费了。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是考古报告, 那么所有的资料和研究也作废了, 这就不是一个人的损失了。我曾专门联系新疆所的所长于志勇先生, 他说不能让学术工作浪费了, 新疆所可以支持出版。可惜, 侯先生去世后, 我一再追问, 侯先生的家人很肯定地说: 没有这样一部书稿。

侯先生在历史系上“考古学概论”课, 特别欢迎同学对有关考古的问题进行探讨。侯先生指导的学生, 我所知是姚崇新和张莉。姚崇新是那个班的班长, 毕业时竟然不能留在乌鲁木齐, 侯先生努力帮忙, 介绍他去了吐鲁番文物局, 从此踏上学术之路。张莉的故事我都是听说, 她接受侯先生指导读书, 帮侯老师

翻译西文资料, 从而对西域考古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 后来读硕士、博士, 所作问题都与西域研究相关。

侯先生的考古工作, 主要是在博物馆和考古所时期进行, 到了新疆师大, 核心工作是学术研究。正是到达新疆师大之后, 侯先生的重要成果纷纷出版, 影响日著, 媒体采访、学术演讲频繁。日本九州大学与新疆师大建立合作关系, 日方的考古学家西谷正教授与中方的侯先生是双方学术代表, 多次以丝绸之路考古为题对新疆各地考古遗址进行考察。加之楼兰考古的新成果, 引起日本学界如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1988年, 日本学术界为纪念“中日邦交和平友好协议签订10周年”, 特地邀请侯灿教授前往日本参加名为“迷幻传奇的古代国家——楼兰特别报告会”, 围绕楼兰考古与丝绸之路, 侯先生在日本举行多场报告会。此后, 侯先生多次应邀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1990年, 侯先生的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学术论文选集, 由书名可知, 主要选取的是高昌和楼兰方面的研究论文。这是中国的出版困难时期, 在出版问题上, 中国学者的窘况人所共知。侯先生的著作得到了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的资助, 最初的出版动议也是西谷正提出的。他想选一些侯先生的论文翻译成日文, 供日本同行参考, 而第一步先在

中国出版一部论文集。论集出版了, 总共只印制了1200本, 可想而知, 很快就洛阳纸贵, 今天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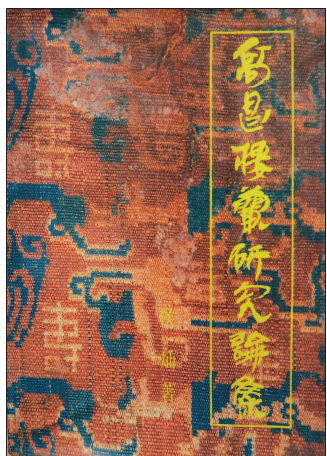
出版《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之后, 侯先生的研究没有止步, 除了高昌历史以外, 楼兰史的研究又增加许多, 所以《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是前一部书的升级版, 内容更丰富, 价值更高。比如围绕楼兰出土的木简和纸文书, 侯先生进行许多新的探索, 而前一部书没有收入, 现在都纳入本书, 尤其是丝绸之路研究和和田历史研究的论文, 更是新近加入。和田作为丝绸之路南道的核心绿洲, 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从佛教历史的视角看, 和田历史的重要性认识完全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侯先生对和田的研究, 也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再结合文献和考古进行的, 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丝路变迁尤其是和田绿洲的变迁, 意义重大。特别是如今丝绸之路研究大热的情况下, 本书会因为这个课题再增新资源。《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 可以看作是侯灿先生西域历史考古研究的全面总结, 是他个人的论文全集。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助了这次重要出版活动, 毕竟是老单位有感情啊。

本来应该作者写后记, 现在只能遗憾地由我代笔。愿侯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并理解。

2019年6月18日北京老营房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侯先生的学术, 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 其次是楼兰, 第三是和田。

各国学者汇聚天一阁探讨古今东西的汉字活字

与雕版印刷并行, 汉字活字印刷在世界范围内也源远流长, 且影响更为深远。目前为止, 除了在中国本土能看到保存下来的汉字活字实物, 在韩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 也能看到前现代时期制作的汉字木活字或汉字近代金属活字实物。至于汉籍中的活字印本, 则存世更多。

9月17日, 来自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二十余位活字印刷和东西方古籍版本专家, 汇聚天一阁, 以国际学术工作坊的形式, 围绕汉字活字印刷的发生、发展和现代遗存, 汉字活字的制作和摆印技术, 东西方活字印刷技术的关系, 东亚活字本的历史和鉴定等问题, 展开自由而深

入的讨论, 以期为学界认识、研究汉字文化的世界影响, 提供一些更具专业性也更为切实的证据。此次学术工作坊由法国远东学院、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天一阁博物馆联合举办。

法国远东学院意大利籍教授米盖拉在报告中指出:

最早的一批由西方人制作出来的带有汉字的印刷品, 产生于伊比利亚半岛。一些由传教士或是教会人士撰写的描写亚洲或中国的著作中会出现几个中文字。最著名的事例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最早将几个中文字介绍给欧洲。这些中文字最初被当作图像插入文本。后来, 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1674—1723)

摄政时代, 着手制定了制作整套活字的计划, 这套活字因此被称为“摄政王的黄杨木字”, 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印刷局。前往欧洲接受神职教育的中国天主教徒黄嘉略在此计划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至少指导了这一大批汉字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就是法国造字计划与之前零星活字的最大差别。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史系教授韩琦的报告关注19世纪传教士的活字印刷从澳门、香港到宁波、上海的传播和流通。法国活字制造专家勒格朗为了降低成本, 制造了偏旁和原字分开铸造的“拼合字(叠积字)”。1884年, 澳门的华英校书坊购买了一套拼合字, 一年后迁到宁波, 改名为“华花圣经书

坊”, 拼合字也随之流传到当时的印刷中心宁波, 随后又传到上海。韩琦认为, 活字印刷技术的流传与当时全球贸易、传教活动、汉字和汉学的传播都有关系, 因此要结合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来讨论。

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介绍了阁藏两种清代最负盛名的活字本, 即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时期朝廷纂修《四库全书》, 下诏征集藏书, 进呈藏书超过五百种的有四家, 其一即天一阁。后乾隆决定御赐每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作为奖励, 这部重要典籍遂进入天一阁, 至今二百余年。对此,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员章宏

伟认为: 在这样一个强调皇权的国度, 宁波的私人藏书机构天一阁如此受重视, 背后或许有更值得研究的广阔的文化关怀; 此外, 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初, 宁波就处在重要地位, 这里曾经是书籍出口日本的重要港口。

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在总结一天的讨论时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 对文献学的研究来说, 实物材料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 文献学的研究, 乃至整个文科研究, 不必以独特性沾沾自喜, 而更应关注共通性, 以活字本为例, 东西方专家聚在一起展示和讨论各自国家活字印刷的差异、共性、流传和影响, 定能产生更多启发。

(高曜)